

老街巷里的抗战医者

于学强

民国时期的成都，既是军阀角逐的西南重镇，也是中西交融的文化名城。街巷藏风云，院落记沧桑，在老成都的街巷深处，便藏着一群爱国医者与仁人志士，以仁心为盾、以热血为刃，在抗战烽火中写下了一段动人往事，绘就了一幅鲜活的蓉城旧影。

棉花街是老成都官商并存、雅俗共赏的生动缩影，因棉商云集、棉包成山而得名。又因清代武英殿大学士卓秉恬的“卓相府”坐落于此，百姓也称之为相府街。青石板路串联起市井喧闹与深宅威仪，清王朝落幕后，卓家后人卓雨农在此以名医之名远扬四方。

卓雨农承家学、精医术，在卓家老宅偏厅院落开设医馆，是成都妇孺皆知的妇科圣手，治愈病患无数。朱门古木犹在，院内药香袅袅，他专攻中医妇科，用药平和，待人谦和，每日求诊者从清晨排至日暮。宰相门第的沉静底蕴，与医者仁心的温厚慈悲，在这条老街上悄然相融。

我的父亲于耀光是山东烟台福山县农家子弟，母亲王庆溶是辽宁营口大桥铁路职工子女。二人在大连勤工俭学，双双考入孟天成博士创办的大连博爱医学院，分别主修内科与妇科。1937年，两人毕业后携同窗之谊与恋人之情，远赴四川成都谋生并结为夫妻。初到成都，父亲先在彭县白水河铜矿担任矿医，后在春熙路开

设私人西医诊所。

父亲将家安在棉花街德茂里一处带天井的两层小院，我于1945年5月19日就降生在这里，童年记忆深深镌刻在老街巷的烟火里。父亲见多识广、思想开明，既精医术，亦心系时局；卓雨农以中医立身，却不囿于门户之见。两人一中一西，一在深巷济世，一在闹市行医，志趣相投，虽行医路径迥异，却因心怀家国而成为莫逆之交。

春熙路1924年由四川军阀杨森主持始建，初名森威路，1926年竣工定名春熙路。到1930年代，这里已是成都乃至西南核心的商业文化地标，银楼、钟表行、药号林立，茶楼、戏院、照相馆云集。这里也是西南图书流通的重要阵地，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等在此设点，《申报图画周刊》曾以“成都宽阔之春熙路”专题报道其盛景。

就在这片繁华闹市中，父亲的西医诊所看似不起眼，却在抗战烽火燃起后，与卓雨农的医馆一道，成为抗日救亡的隐秘阵地。二人以诊所为掩护，利用行医之便，秘密参与抗日救亡运动，或为进步人士诊病疗伤，或暗中传递消息、接济爱国青年，在车水马龙间，默默守护一方正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卓雨农作为医界翘楚曾出任四川省政府委员、四川省政协委员，他多次向友人提及、感念与我父亲于耀光合力开展医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义举。

父亲与母亲的春熙路诊所，是成都地下抗日活动的重要联络点，两人都是热心救国的进步人士，在这里结识了齐鲁大学内迁成都后、活跃于华西坝的学生运动骨干陈寰。陈寰年轻果敢、满腔热血，奔走于华西坝五大学（抗战爆发后，齐鲁大学、金陵大学、金陵女子文理学院、燕京大学、中央大学医学院相继内迁于此，组成华西坝五大学联合办学）之间，组织宣传、募捐、救护，是抗日救亡的中坚力量。母亲的抗日救亡之路，也被华西坝的学子热血照亮，爱国热情在这片土地上迸发出炽热的火花。因东北老乡之缘，母亲与陈寰拜为干姊妹，于家夫妇待她如亲妹，三人以亲人相称，并肩投身救亡工作。

诊所的诊室与后堂，常成为进步学生碰头商议的安全场所，白衣之下藏着一颗颗赤子丹心。母亲与陈寰时常在外奔波，为抗日救亡募集资金。母亲不仅多次慷慨解囊，还秘密为前方抗日将士筹措医疗物资，甚至参演华西坝五大学爱国团体“海潮社”的抗日话剧，以文艺唤醒民众家国情怀。解放前夕，陈寰调至北京继续从事学运工作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事政治组组长。1982年我赴京拜访时，她仍一再感念我母亲的支持，称赞她在烽火岁月中彰显了一名医者的赤诚与担当。

我父亲的抗日足迹，还与云南入川的抗日志士桑即藩紧紧相连。父亲早年在彭县白水河铜矿任矿医时，便与桑即藩相识。桑即藩以国民党资源委员会铜矿专员身份为掩护，暗中发动矿工、宣传抗日，两人一见如故。后来两人在春熙路诊所重逢，身份虽异，救国之心无二，当即约定联手行动。父亲以医生身份为掩护，为地下工作提供便利；桑即藩则凭借广泛社会联系，组织工人运动、联络各界力量。两人密切配合，让那间小小的西医诊所，成为连接学界、工界、医界的重要抗日纽带。

从相府街的宰相旧宅到名医医馆，从春熙路的繁华闹市到隐秘联络点，从华西坝的琅琅书声到学子热血，老成都的每一条老街、每一座院落，都藏着一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往事。卓雨农的药箱里，藏着医者的家国担当；于耀光夫妇的白大褂下，跳动着赤子的爱国丹心；陈寰与桑即藩的奔走中，凝聚着仁人志士的救亡力量；华西坝学子的呐喊里，激荡着青年一代的民族风骨。他们的身影交织在一起，绘就了一幅家国同在、风骨凛然的民国成都长卷。

一街藏古今，一坝汇中西，一城记风云。那些藏在老成都青石板与老砖墙里的故事，不仅是街巷的独家记忆，更是一座城市的文脉与风骨，历经岁月洗礼，依旧历久弥新，光照后人。

墨香未远

祁奇

前辈郝老师的办公桌堪称一景，上面堆满了各种有年头的报纸杂志，一摞一摞，随着年份慢慢“长高”。

那天，郝老师从书柜里取出文件夹，打开后，一张张泛黄的报纸带着旧时光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翻阅间，我被其中一张吸引住——朴拙中透着筋骨的四字报头“建行信息”，下方有一行小字“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徐州分行1996年2月”。“这是咱们银行名称带有‘人民’字样的最后一期。”郝老师的手指抚过报头，如同抚过一段悠长的时光，“那年3月，‘中国人民建设银行’正式改名为‘中国建设银行’。行名换了，可咱们的报纸没停。报头改了，可该记录的事，一件也没落下。”他将目光投向窗外，仿佛穿透了20多年的光阴。

我的目光被报纸上几幅线条生动的插画吸引：银行里排队取款的剪影，储蓄卡便捷消费的热闹场景……笔触质朴却充满生气。

“这都是您画的？”我忍不住问。郝老师笑了：“那时候没现在方便，拍照得洗胶卷，赶不上排版。我就揣个速写本，看到有意思的场景，随手勾几笔，正好配这一期宣传储

蓄卡的主题。”“你瞧，为了让老百姓看明白这‘新鲜玩意儿’怎么用，可费了不少心思。”他指着几张不同年份报纸的版面痕迹，向我讲述那些消逝的工艺，“你看，这份1992年的报纸用的是铅字印刷，一个版面做下来，要经历铅块熔化、铸字、检字、排版、压版、印刷等一系列工序，报纸上都是油墨和铅灰的味道。这一版，胶印的。再后来进步了，就用了激光照排。”

报纸头版上，一行醒目的标题跃入眼帘——《消费史上划时代的革命》。字里行间，洋溢着对ATM机和储蓄卡推广的笃定与热情。郝老师的目光也落在那标题上：“那事后，真觉得这种高科技要翻天覆地。谁能想到，当年这些要专门写文章推广的‘革命’，如今成了像呼吸一样自然的事？”发黄的纸页上，那些曾经滚烫的预言，如今静静诉说着时代的奔涌不息。

这期见证着行名更迭的《建行信息》，我有幸珍藏了一份。我将它细心装进素色木框，摆在我的办公桌上。阳光透过窗户，洒在微黄的纸面，也落在我的电脑屏幕。30多年后，郝老师主编的《建行信息》已更名为《行

务资讯》，而我也成为了新的编辑。缘分，如此奇妙。

指尖敲击键盘的间隙，抬眼便是那方木框。前辈们亲历过的时代印记，如今化为我指尖敲出的字符，一个邮件便能抵达全行。虽然形式和载体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但我该做的是，把对文字的敬畏、对信息的责任、对记录建行的执着，清晰而坚韧地传递下来。

郝老师说：“咱们分行办报，印刷从铅火变激光，再变‘无纸’，名字变简洁，可心里那根弦没变——分行里那些书写‘金融为民’的大事小情，员工们的拼搏创新，总得有人好好记下，认真传开。”此刻，当我用鼠标点击“发送”，将新一期的《行务资讯》送达各支行、部门的办公邮箱，屏幕上的光晕与木框中泛黄的纸页仿佛在时空中重叠。这不只是技术的接力，更是一份无声的承诺——墨香或许会淡，纸页终将会黄，但几代人对信息宣传工作的那份热爱与专注，将在每一次郑重其事的落笔与点击中，历久弥新，行远不息。

木框静立，纸页无言。我将接过前辈们点燃的光，照亮继续前行的路。

密钥

王子卉

他们在玻璃上刻下更深的纹路
指纹缠绕成新的锁孔
我数着黄昏发光的刻度
在云端 在掌中 在无人认领的
虹膜深处

有人用静脉浇灌铁树
银白的枝杈遮蔽归途
当目光滤尽所有颜色
视线便成为最精确的囚徒

我穿过数字的迷阵
符号的雨湮没来时的痕迹
当记忆碎成千层的镜面
每一片都映出变形的追逐

但总有一扇窗忘了密文
某阵风推开它的清晨
带着泥土初醒的体温
和那粒始终沉睡的——
未曾发芽的初心

